

《朗读者》第二季,一批新老上海人亮相,在荧屏上汇成一道上海风景,也为城市精神留下几笔注脚

读懂这些朗读者,更会深爱上海这座城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最新一期《朗读者》,84岁高龄的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登台,回顾1978年“科技的春天”,也把他在上海,在父亲陈伯吹循循善诱下的少年时光娓娓道来。

这已不是本季《朗读者》中第一张“上海面孔”了。从第一期开始,嘉宾阵容里既有土生土长的上海儿女——姚明、胡歌、王佩民、马伊琍、谭元元,也有如今在此迎向事业新旅程的新上海人——赖声川、王洛勇,更有在上海度过一生中重要时光、成为这座城市骄傲的人——吴孟超、牛犇、程不时、王智量。感谢节目不以演艺明星谋流量、坚持“娱乐逆行者”的姿态,观众得以看见这批新老上海人从各行各业走来,在荧屏上汇成一道上海风景。

上海,城市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城市里的人,而人塑造城市气质、推动城市发展。朗读者们的述说,隐隐间连点成线,串起一座城市气质秉性的养成。读懂他们,也就读懂了上海,更会深爱这座“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

一滴水折射太阳,他们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骄傲注脚

城市人口千万,人对于他所生活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当96岁的吴孟超第N次握住病患的手,听他们说“谢谢”;当90岁的王智量纯真如孩子般说,“我的译本还是很好的”;当88岁的程不时在欢庆C919试飞成功的人群里,红了眼眶;当84岁的牛犇第一次在党旗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70岁的王佩民望着父亲王孝和的照片说,“我比年少时更需要一个父亲”——一滴水折射太阳。正因这些英雄儿女,城市的荣光历岁月愈灿烂。

他们的命运与上海相连的那一刻,时间并不一致。1948年9月,



①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C919专家顾问团成员程不时。②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③第24届上海电视节目“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演员马伊琍。

上海,城市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城市里的人,而人塑造城市气质、推动城市发展。朗读者们的述说,隐隐间连点成线,串起一座城市气质秉性的养成。读懂他们,也就读懂了上海,更会深爱这座“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



王佩民之父王孝和牺牲,他带着无所畏惧的笑容倒在了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一年零一天的傍晚。21天后,烈士的小女儿也就是“朗读者”王佩民出生。那时候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呢?曙光之前,至暗时刻。还有许许多多如王孝和那样用信仰和鲜血谱写壮歌的英雄斗争在城市的长街小巷,随时准备为上海乃至全中国的解放奉献生命。

1949年,吴孟超回到祖国已十年了。昆明求学那会儿,年轻人向往延安,但听从师长的建议,立志“好好念书,科学救国”。这一年,他学成,考入原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附属医

院,从此扎根上海。在这里,他受郑宝琦慧眼识人,又受恩师裘法祖点拨,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肝胆外科新天地。在上海近70载,吴孟超之名与奇迹相连: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胆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无数个“第一”见证中国肝胆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卓绝探索,更记录着一位以

身许国的青年人如何成长为匡危济世的国之大厦。1952年,牛犇跟着剧组里的哥哥姐姐走进上海。初时,拍戏对于未成年的他,只是一桩求果腹的劳动。此后漫长的66年里,身边的共产党员和他们塑造的银幕上的共产党人让他越发明晰,为什么这座孕育中国电影的城市能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第一个音符,能目睹《共产党宣言》在此发表,更能见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诞生。生活工作在这座红色之城,他矢志不渝、一生跟党走的信念,更与时光共绵长。又过了十多年,从文的王智量和攻

理的程不时相继来到上海。一位砥砺数十载为中国读者捧出原汁原味带着普希金韵脚的译作,一位穷尽一生奉献给中国的飞机梦。程不时有段描述,情景再现了奋斗的日子:1970年代,一群年轻人总是昼伏夜出,每晚12点到次日清晨6点,他们与上海最大的一台计算机共同运作。炎夏时节,龙华机场草地深处,大家用报纸裹住手臂,防蚊更防汗水滴落在图纸上。他们眼前所见、心里所念,是中国第一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客机运-10,从无到有。多年后,在C919宽敞的生产基地,退役的运-10底下有块大基石,上书“永不放弃”。每一位经过那里的飞机设计师,无不心潮澎湃。

著名评论家朱伟的新著《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刷屏”

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钱好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这些天,《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写的这段话,伴随着他新近出版的《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屡屡“刷屏”。

讲述1980年代文学史的作品有很多。《重读八十年代》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文学编辑的角度,近距离地、鲜活地重现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苏童说:“如果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当年在《人民文学》任编辑的朱伟,曾推出了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

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系统重读和点评了十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在他的记录中,作家们“成名前”的写作风格和之后创作轨迹的变化,文学期刊打破以往条框、力推新人的“编辑部故事”,都得以一一浮现。有人说,这是一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文学史”,对当年的作家作品有着一份“亲历者”的体察。而改革开放给文学界带来的思想、创作风潮的变化,也在他的记录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朱伟的“重读”,也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有意义的回望。

莫言的成名作是被“逼”出来的,余华最初学的是川端康成

今天我们回顾1980年代,会惊叹于莫言、余华、苏童等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横空出世。但倘若真正将时间拨回当初,许多作家的出场,并没有那么石破天惊。今天在文坛占据中坚地位的很多作家,早期作品的风格颇有些令人意外。而他们在创作转变的契机和轨迹,都在朱伟的这部书中留下了有趣而鲜活的印记。

书中写到,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逼”出来的。当年,莫言入选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届学员,同学中最出名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开学后,班上专门开会讨论李



存葆的新作,在一片赞扬声中,唯有莫言坦率地唱了反调,而且言语中毫不客气。这个出言不逊的毛头小子,自然引来了众人的不满;只会说别人,自己又能写出什么呢?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莫言一口气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他要用一部作品来“争一种东西”。

在此之前,莫言只发表过四五个短篇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霖霖》写的是一位“军嫂”向守岛部队的丈夫表达思念之情。用朱伟的话说:“如果只看他刚开始的短篇,会觉得很难,觉得他完全不可能成功。”但《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真有一下子耀亮文坛的感觉”。朱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认准了莫言。在他看来,“还没有人能有意愿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的”感觉”。在那以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赶往魏公村军艺的宿舍找莫言,之后《爆炸》《红高粱》都是经他之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所以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契机,看自己是不是遇到自己合适的写作方法。”朱伟说。余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华最初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星星》,写的是一个不合群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和忧伤,这篇文章在朱伟看来是“矫情稚嫩”,是一则叙述直白的“习作”。后来与余华聊天时,他告诉朱伟,自己最初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因为《伊豆的舞女》而开始创作,所以走的也是细腻敏感的路子。但在朱伟看来,余华不是一个感觉特别细腻的作家,如果顺着川端康成的路子写,可能一辈子都写不出来。直到1986

年的,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后,他才如同醍醐灌顶,明白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才有了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余华脱胎换骨,一跃成为最耀眼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从这些“蜕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解放和活跃,海外文学的大量引进和传播,对于作家们产生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些改变,造就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

百花齐放的文学高峰,编辑是幕后英雄

陈村对于《重读八十年代》有这样的“概括”:“这本书阐述的是作家们如何凭那种被认为很不入流的写法爬上文坛,编辑处心积虑将作品给鼓捣上版。”虽是戏谑,却也道出了重要的事实——当年,许多先锋的作品并不受到广泛认可,倘若没有编辑敏锐的发现和力排众议、打破常规在期刊上推出的勇气,文学的走向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高峰,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们在幕后的推动密不可分。

余华对朱伟有这样的评价:“在那个时代,他对小说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部又一部当时离经叛道现在已成典范的小说。”

1985年,朱伟拿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篇大胆的现代派小说让他读后直感到热血沸腾。但有人跟他说:“这篇稿子,你们《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之前,《人民文学》主要发

探索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赵启正新闻传播案例》一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许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如何向世界讲述?一本反映对外宣传领域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图书《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赵启正新闻传播案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赵启正长期担任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该书从赵启正发表的演

纪录片《我们的40年》昨收官,让人们看到:40年的发展就藏在百姓的平常日子里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昨天,纪录片《我们的40年》播出最后一集。这部作品是上海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栏目推出的四集专题,全片采用了以往海内外纪录片中丰富的影像资料,重新剪辑、组合而成。

《我们的40年》从“衣、食、住、行”这几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切口切入,展现了40年间上海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下的生活变化。节目自播出以来便收获不小的关注——创下了《纪录片编辑室》栏目上半年自制节目收视纪录,围绕节目的线上互动问答点击量超过50万。

“用珍贵的老镜头唤醒那些人们至今仍记得,但已经有些模糊的集体回忆,这份有温度的重温与解读,更能生动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发展。”纪录片的策划人兼撰稿人汪求实说。

40年的发展就藏在百姓的平常日子里

看《我们的40年》,仿佛打开了一幅横跨40年的上海风情画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火钳除了夹煤球,还被爱美的女性拿来烫头发,掌握不好火候便是一股焦糊味;1985年,新中国第一家美容厅“露美”出现在上海淮海路上,当年做一次全套美容护肤要20多元,相当于当时上海青工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的高价依旧挡不住人们爱美之心;早年,上海人用“螺蛳壳里做道场”形容拥挤的居住状况,静安区“小辛庄”棚户区便是代表。因为拥挤的居住条件,棚户区极易发生火灾,居民们常常互相提醒“小心”,谐音“小辛庄”一名由此而来;对老一辈的上海人来说,“七六五”这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种时尚体验——早年,市面上的服饰选择很少,一款定价七元六毛五分的男士皮鞋风靡一时,被人们称为“七六五”。

《我们的40年》中许多生动的百姓生

讲、报告、文章、答记者问中精选了60余个经典案例,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他作为中国对外宣传工作负责人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揭示了他不断开拓外宣工作新局面的心路历程。除了赵启正的原作外,书中还有20多篇导读、解读文章,是对赵启正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介绍、说明和阐述。

纪录片《我们的40年》昨收官,让人们看到:40年的发展就藏在百姓的平常日子里

用老镜头回望上海从前的衣食住行

生活片段则构成了宏观背景下鲜活的叙事案例。1980年11月,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在上海诞生,上海姑娘徐萍是模特队成员。有有趣的是,后来中国时尚潮流越刮越猛,当初强烈反对女儿当模特的母亲,自己也加入了老年时装模特队,烫个最时髦的短发,画上精致的妆容,再披上最流行的款式,竟抢走了女儿的风头。

从24部国内外纪实作品中精选丰富的影像资料

《我们的40年》通过“衣、食、住、行”四大主题分为四集,总片长约两个小时,从24部国内外纪实作品中精选了丰富的影像资料。这24部作品中,包括三部国外电影纪录片、四部国内电影纪录片及17部电视纪录片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享誉国际的纪录片佳作。

《我们的40年》中一些极具年代感的珍贵画面来自知名海外纪录片。在昨天播放的最后一集中,选自日本导演牛山纯一的知名纪录片《中国新风貌》的诸多镜头让观众惊艳。在这部拍摄于1978年10月的纪录片中,导演用细腻的手法,展现了静安区张家宅地区石库门弄堂中,一户普通居民的平凡一天。片中,一位钟姓大妈清晨五点半便起床匆匆赶往菜场,凭票购买食物。正当钟大妈买好菜刚准备回家之际,菜场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很多顾客涌向了卖鱼的摊位。原来,那时候,带鱼鱼等要凭票供应,但是有一种从深海里捕捞上来的橡皮鱼是敞开供应的,不凭票便能买到。只要橡皮鱼一出现,很快便会被抢购一空。又如《我们的40年》采用的一部法国纪录片影像资料,生动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普通市民在酒店办婚礼的珍贵镜头。